

造化弄人·欲說還休

瞿秋白的自白——「多餘的話」(上)

● 瞿秋白遺著

編者按：瞿秋白是中國共產黨繼陳獨秀後的第二任領導人。民國二十四年共軍在江西瑞金被國軍圍攻突脫西走時，中共令病弱的瞿秋白留後活動，終致為國軍在福建長汀捕獲，死時三十六歲。在臨刑之前於獄中寫下「多餘的話」的遺墨，表示是他「最後的最坦白的話」，自述其身世志趣和參加中共成為領導等經過及剖析心路歷程。這位文學者型的悲劇人物，自認其走上原非本性之路是「歷史的誤會」，出語蒼涼無奈、令人歎惋。中共「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把瞿秋白由「烈士」打成「叛徒」，就是以此文作為死後算帳的「罪証」。

何必說？代序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

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著這個，心裏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澈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這裏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也未必有出版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

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歷史的誤會

瞿秋白一九三五，五，十七於汀州獄中。

我在母親自殺家庭離散之後，孑然一身跑到北京，只願能夠考進北大，研究中國文學，將來做個教員度過這一世，甚麼「治國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沒有的，壞在「讀書種子」愛書本子，愛文藝，不能安分守己的，專心於升官發財。到了北京之後，住在堂兄純白家裏，北大的學膳費也希望他能夠幫助我——他卻沒有這種可能，叫我去考普通文官考試，又沒有考上，結果，是挑選一個既不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進。這樣，我就開始學俄文了（一九一七夏），當時並不知道俄國已經革命，也不知道俄國文學的意義，不過當作將來謀一盤飯吃的本事罷了。

一九一九年開始看了許多新雜誌，思想上似乎有相當進展，新的人生觀正在形成。

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毋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我同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五四運動期間只有極短期的政治活動，不久，因為已經能夠查著字典看俄文文學名著，我的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藝方面了，對於政治上的各種主義，都不過略略「涉獵」求得一些現代常識，並沒有興趣去詳細研究。然而可以說，這時就開始「歷史的誤會」了：事情是這樣的——五四運動一開始，我就當了俄文專修館的總代表之一，當時的同學裏，誰也不願意幹，結果，我得做這一學校的「政治領袖」，我組織同學群眾去參加當時的政治運動。不久，李大釗、張崧年他們發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或是「俄羅斯研究會」罷？）我也因為讀了俄文的倍倍爾的婦女與社會的某幾段，對於社會——尤其是社會主義最終理想發生了好奇心和研究興趣，所以也加入了，這時候大概是一九一九年底一九二〇年初，學生運動正在轉變和分化，學生會的工作也沒有以前那麼熱烈了。我就多讀了一些書。

最後有了機會到俄國去了——北京晨報要派通信記者到莫斯科去，來找我。我想看一看那「新國家」，尤其是借此機會把俄國文

學好好研究一下，的確是一件最愜意的事，於是動身去。（一九二〇年八月）

最初，的確吃了幾個月黑麵包，餓了好些時候，後來俄國內戰停止，新經濟政策實行，生活也就寬裕了些。我在這幾個月內請了私人教授，研究俄文、俄國史、俄國文學史，同時為著晨報的通信也很用心看俄國共產黨的報紙、文件，調查一些革命事蹟。我當時對於共產主義只有同情和相當的了解，並沒有想到加入共產黨，更沒有心思要自己來做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因為那時候，我誤會著加入了黨就不能專修文學——文學彷彿就是不革命的觀念，在當時已經通行。可是，在當時的莫斯科，除我以外，一個俄文翻譯都找不到。因此，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的時候（一九二一年秋）我就當了東大的翻譯和助教；因為職務的關係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不得不研究些，而文藝反而看得少了。不久（一九二二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那時我已經是共產黨員，還是張太雷介紹我進黨的）我就當他的翻譯。獨秀回國的時候，他要我回來工作，我就同了他回到北京。于右任、鄧中夏等創辦上海大學的時候，我正在上海，這是一九二三年夏天，他們請我當上海大學的教務長兼社會學系主任，那時，我在黨內只兼著一點宣傳工作，編輯「新青年」。

上大初期，我還有餘暇研究一些文藝問題，到了國民黨改組，我來往上海、廣州之

間，當翻譯，參加一些國民黨工作（例如上海國民黨中央執行部的委員等）；而一九二五年一月共產黨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我當中央委員，這時候，就簡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我的肺病又不時發作，更沒有可能從事於我所愛好的文藝。雖然我當時對政治問題還有相當的興趣，可是有時也會懷念著文藝而「悵然若失」的。

武漢時代的前夜（一九二七年初），我正從重病之中脫險，將近病好的時候，陳獨秀、彭述之等的政治主張，逐漸暴露機會主義的實質，一般黨員對他們失掉信心。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大會上（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間）獨秀雖然仍舊被選，但是對於領導已經不大了。武漢的國共分裂之後，獨秀就退出中央，那時候，沒有別人主持，就輪到我主持中央政治局。其實，我雖然在一九二六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初就發表了一些議論反對彭述之，隨後不得不反對陳獨秀。可是，我根本上不願意自己來代替他們——至少是獨秀。我確是一種調和派的見解，當時只想獨秀能夠糾正他的錯誤觀念，不聽述之的理論，等到實逼處此，要我「取獨秀而代之」，我一開始就覺得非常之「不合式」，但是，又沒有別的辦法。這樣我擔負了直接的政治領導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八年五月）。這期間發生了南昌暴動。當時，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主持的，我却因為對組

織尤其軍事非常不明瞭也毫無興趣，所以只發表一般的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畫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覺得好像是拆台，這樣，勉強著自己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反對我，也有許多同志贊成我，我的進退成爲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罷，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勢禁，舊幹部中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只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可是，事實上六大之後，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者是李立三和向忠發等等，因爲他們在國內主持實際工作，而我只在莫斯科當代表當了兩年。直到立三的政治路線走上了錯誤的道路，我回到上海開三中全會（一九三〇年九月底）我更覺得自己的政治能力確實非常薄弱，竟辨別不出立三的錯誤程度。結果，中央不得不再召集會議——就是四中全會。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我的政治局委員，新幹部起來接替了政治上的最高領導，我當時覺得鬆了一口氣，從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當了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最後三年甚至彷彿是最主要的領袖（不過沒有像外間所傳說的「總書記」的名義）。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方面也是十幾年爲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實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到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

渴念「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經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滿三十六歲（雖然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本來我從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一直沒有好醫治的機會，肺結核的發展曾經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險的階段，那年幸而勉強醫好了，可是立即趕到武漢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緊張的工作。雖然現在肺癆的最危險期逃過了，而身體根本弄壞了，虛弱得簡直是一個廢人。從一九二〇年直到一九三一年初，整整十年——除卻躺在床上不能行動神志昏瞶的幾天以外——我的腦經從沒有得到休息的日子，在負責時期，神經的緊張自然是很厲害的，往往十天八天連續的不安眠，爲著寫一篇政治論文或者報告。這繼續十幾年的不休息，也許是我精神疲勞和十分厲害的神經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離衰老期還很遠，這十幾年的辛勞，確實算起來，也不能說怎麼了不得，而我竟成了頹喪殘廢人了，我是多麼脆弱，多麼不禁磨鍊呵！或者，這不僅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廣韶，還在湖北布政司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

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在幾十年前已經賣盡，而我小的時候，卻靠著叔祖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面「必須」繼續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僕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賬。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面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同時，我廿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候，理智方面是從托爾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思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

，避免鬥爭，……以至寄生式的隱士思想，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份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份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思索了。

體力上的感覺是：每天只要用腦到兩三小時以上，就覺得十分疲勞，或者過分的畸形的興奮，以至於不能睡覺，腦痛……冷汗。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思主義

當我開始我的社會生活的時候，正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的浪潮非常洶湧的時候。為著繼續深入的研究俄文和俄國文學，我剛好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國家」去。我那時的思想是很紊亂的；十六、七歲時候開始讀了些老莊之類的子書，隨後是宋儒語錄，隨後是佛經，大乘起信論，在到俄國之前，固然已經讀過倍倍爾的著作，共產黨宣言之類，極少幾本馬克思主義的書籍，然而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是根本說不上。

而且，我很小的時候，就不知怎樣有一個古怪的想頭：為什麼每一個讀書人都要去「治國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種學問或是文

藝研究一下不好嗎？所以我到俄國之後，雖然因為職務的關係時常得讀些列寧他們的著作，論文演講，可是這不過求得對於俄國革命和國際形勢的常識，並沒有認真去研究。政治上一切種種主義，正是「治國平天下」的各種不同的脈案和藥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師」，不想做「諸葛亮」——這些事自然有別人去幹——我也不去深究了。不過我對於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終極理想，卻比較有興趣。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到達到這樣的最終目的，客觀上無論如何也逃不了尖銳的階級鬥爭，以至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國家的一個階級。為著要消滅「國家」一定要先組織一時期的新式國家；為著要實現最徹底的民權主義（也就是無所謂民權的社會），一定要實行無產階級的民權。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實際上很有道理的邏輯——馬克思主義所謂辯證法——使我很覺得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我沒有功夫去管什麼主義不主義。後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誰知越到後來越沒有功夫繼續研究文學，不久就喧賓奪主了。

但是，我第一次在俄國不過兩年，真正用功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常識不過半年，這是隨著東大課程上的需要看一些書，明天要譯經濟學上的那一段，今天晚上先看過一道，作為預備，其他唯物史觀哲學等等也是如此，這絕不是有系統的研究，至於第二次我到俄國（一九二八—一九三〇），那是當著共產黨的代表，每天開會解決問題，忙個不了，更沒有功夫做有系統的學術上的研究。

馬克思主義上的主要部分：唯物論的哲學，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理論，以及經濟政治學，我都沒有系統的研究過。資本論——我就根本沒有讀過，尤其對於經濟學我沒有興趣。我的一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常識，差不多都是報章雜誌上的零星論文和列寧幾本小冊子上得來的。可是，在一九二三年的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至一般社會科學的人，還少得很；因此，僅僅因此，我擔任了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之後，就逐漸的偷到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的虛名。其實，我對這些學問，的確只知道一點皮毛。當時我只是根據幾本外國文的書籍轉譯一下，編了一些講義。現在看起來，是十分幼稚，錯誤百出的東西。現在已經有許多新進的青年，許多比較有系統的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國際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水平也提高了許多。

還有一個重要的「誤會」就是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的現代社會，部分的是研究

中國歷史的發端——也不得不由我來開始嘗試。五四以後的五年中間，記得只有陳獨秀、戴季陶、李漢俊幾個人寫過幾篇關於這個問題的論文，可是都是無關重要的。我回國之後，因為已經在黨內工作，雖然只有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卻不由我不開始這個嘗試：分析中國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程度，分析中國社會階級分化的性質，階級鬥爭的形勢，階級鬥爭和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的關係等等。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我在這方面的工作，自然，在全黨同志的督促、實際鬥爭的反映，以及國際的領導之下，逐漸有相當的進步。這決並不是我一個人的工作，越到後來，我的參加是越少。單就我的成績而論，現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可明顯的看見，我在當時所做的理論上的錯誤，共產黨怎樣糾正了我的錯誤，以及我的幼稚的理論之中包含著怎樣混雜和小資產階級機會主義的成分。

這些機會主義的成分發展起來，就形成錯誤的政治路線，以致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不能不開除我的政治局委員。的確，到一九三〇年，我雖然在國際參加了兩年的政治工作，相當得到一些新的知識。受到一些政治上的鍛鍊，但是，不但不進步，自己反而覺得退步了。中國的階級鬥爭早已進到了更高的階段，對於中國的社會關係和政治形勢，需要更深刻更複雜的分析，更明瞭的判斷，而我的那點智識絕對不夠，而且非無產

階級的反布爾塞維克的意識就完全暴露了，當時，我逐漸覺得許多問題，不但不想通，甚至不想動了。新的領導者發揮某些問題議論之後，我會感覺到鬆快，覺得這樣解決原是最適當不過的，我當初為什麼簡直想不到；但是——也有時候會覺得不了解。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了。

同時要說我已經放棄了馬克思主義，也是不確的。如果要同我談起一切種種政治問題，我除了根據我那一點一知半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來推論以外，卻又沒有什麼別的方法。事實上我這些推論又恐怕包含著許多機

會主義，也就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在內，這是一「亦未可知」的。因此我更不必枉然費力思索；我的思路已經在青年期走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初步，無從改變；同時，這思路卻同非馬克思主義的歧路交錯著，再自由任意的走去，不知會跑到什麼地方去。——而最主要的是我沒有氣力再跑了，我根本沒有精力再作政治的社會科學的思索了。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當我不得不擔負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的時候，正是中國革命進到了最巨大的轉變和震盪的時代，這就是武漢時代結束之後。

分析新的形勢，確定新的政策，在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階級鬥爭最複雜最劇烈的路線匯合分化轉變的時候，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任務。當時許多同志和我，多多少少都做了政治上的錯誤；同時更有許多以前的同志在這階級鬥爭更進一步的關口，自覺的或者不自覺的離開了革命隊伍，在最初，我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決定的政策一般的是正確的，武漢分共之後，我們接著就決定賀葉的南昌暴動兩湖廣東的秋收暴動（一九二七），到十一月又決定廣州暴動，這些暴動本身並不是什麼盲動主義，因為都有相當的群眾基礎。固然，中國一般的革命形勢，從一九二七年三月底英美日帝國主義者砲轟南京威脅國民黨反共以後，就已經開始低落；但是，接著而來的武漢政府中的奮鬥、分裂……直到廣

州暴動的舉出蘇維埃旗幟，都還是革命勢力方面正當的挽回局勢的嘗試，結果，是失敗了——就是說沒有能夠把革命形勢重新轉變到高漲的陣容，必須另起爐灶。而我——這時期當然我應當負主要的責任——在一九二八年初，廣州暴動失敗之後，仍舊認為革命形勢一般的存在，而且繼續高漲，這就是盲動主義的路線了。原本個別的盲動現象，我們和當時的中央從一九二七年十月起就表示反對的；對於有些黨部不努力去領導和爭取群眾，反而孤注一擲，或者僅僅去暗殺豪紳之類的行動，我們總是加以糾正的。可是，因為當時整個路線錯誤，所以不管主觀上怎樣了解盲動主義現象的不好，費力於枝枝節節的糾正，客觀上卻在領導盲動主義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糾正了這個錯誤路線，使政策走上了正確的道路。自然，武漢時代之後，我們所得到的中國革命之中的最重要的教訓：例如革命有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可能和前途，反帝國主義革命最密切的和土地革命聯繫著等……都是「六大」所採納的，蘇維埃革命的方針，就在「六大」更明確的規定下來。

但是以我個人而論，在那時候，我的觀點之中不僅有過分估量革命形勢的發展以致助長盲動主義的錯誤。對於中國農民的分析，認為富農還在革命戰線之內，認為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某某大城市取得暴動的勝利等觀念，也已經潛伏著或者有所表示。不過，

同志們都沒有發覺這些觀點的嚴重錯誤，還沒有指出來，我自己當然更不會知道這些是錯誤的。直到一九二九年秋，討論農民問題的時候，才開始暴露我在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不幸得很，當時沒有更深刻更無情的發揚……此後，就來了立三路線的問題了。

一九二九年底，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就聽說立三和忠發的政策有許多不妥當地方。同時，莫斯科中國勞動大學（前稱孫中山大學）的學生中間發生非常劇烈的鬥爭，我向來沒有知人之明，只想彌縫緩和這些內鬥，覺得互相攻訐批評的許多同志都是好的，聽他們說的事情卻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誇大事實作為「打倒」對方的理由；由此，我就站在調和的立場。這使得那裏的黨部認為我恰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結果，撤銷了我的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準備回國。自然，在回國任務之中，最重要的是糾正立三的錯誤，消滅莫斯科中國同志之間的派別觀念對於國內同志的影響。但是，事實上我什麼也沒有做到，立三的錯誤在那時——一九三〇年夏天——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半托洛茨基的路線，派別觀念也使得黨內抑制莫斯科回國的新幹部。而我回來之後召集的三中全會，以及中央一切處置，都只是零零碎碎的糾正了立三的一些顯而易見的錯誤，既沒有指出立三的錯誤路線，更沒有在組織上和一切計劃及實際工作上保障國際路線的執行，實際上我的確沒有認

出立三路線的根本不同。

老實說，立三路線是我的許多錯誤觀念——有人說是瞿秋白主義——的邏輯的發展。立三的錯誤政策可以說是一種失敗主義，他表面上認為中國全國的革命勝利的局面已經到來，這會推動全世界革命的成功，其實是自己沒有把握保持和發展蘇維埃革命在幾個縣區的勝利，覺得革命前途不是立即向大城市發展而取得全國勝利以至全世界的勝利，就是迅速的敗亡，所以要孤注一擲的拼命。這是在組織上，在實際上，在土地革命理論上，在工會運動的方針上，在青年運動和青年組織等等各種問題上……無往而不錯。我在當時卻辨別不出。事後我曾說：假定「六大」之後，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麼，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不過不致於像立三這樣魯莽，也可以說，不會有立三那樣的勇氣。我當然間接的負責立三路線的責任。

於是四中全會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萬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

舞台。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幹一幹「以度餘年」。可惜接著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了三年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為著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一部分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卻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著政治卻又不得不略為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為馬克思主義奮鬥，為蘇維埃革命奮鬥，為著黨的正確路線奮鬥嗎？例如公事辦了些，說奮鬥確實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未完待續）

編輯報告

編輯部謹啓

△本誌三七八期八月號第一一頁第二行應為：

王志恒（前高雄縣議會議員）**選輯**

第三行應為：

喻齡居（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董事兼編輯委員）**校訂**

△三七八期第廿八頁照片說明②應為：王魯翹（右）與作者陳應彭（左）合影。

△三七八期第七十二頁第一行標題應為「八二三金門砲戰秘錄讀後」。

△本誌三七八期第七十三頁下欄第六行第九字「但」開始至第十行「肆意轟擊」。

止共七十八字，應刪除，特此更正，敬請讀者注意。

△三七八期「海軍官校粹勵四年」作者應為「黃宏基」特此更正，並向作者致歉。